

国学大讲堂

【诗经导读】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诗经导读】

国学大讲堂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导读 / 陈子展, 杜月村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2864-1

I. 诗... II. ①陈... ②杜... III. ①古体诗-中国-春秋时代 ②诗经-注释 IV.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123号

诗经导读

著者	陈子展 杜月村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地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940 1/16
字数	229千字
印张	18.5
印数	5000册
版次	2008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8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2864-1 / B · 59
定价	29.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的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学习国学必先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年11月

目 录

导 言

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3
(一)《诗经》的书名和篇目	3
(二)《诗经》产生的时代	5
(三)《诗经》产生的地域	10
(四)《诗经》的作者	11
二、《诗经》的编订与分类	13
(一)《诗经》的编订	13
(二)《诗经》的分类	16
三、《诗经》的思想内容	23
(一) 关于生产劳动	23
(二) 关于爱情婚姻	26
(三) 关于徭役战争	30
(四) 关于政治讽刺	31
(五) 关于史诗	34
四、《诗经》的艺术特色	37
(一)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37
(二) 形象的刻画和丰富的想象	41

(三) 语言形式的特点	43
五、《诗经》的传习和研究	48
(一) “赋诗言志”和“群籍引诗”	48
(二) 四家诗的传习	51
(三) 关于《诗序》	56

《诗经》注析

国 风	65
周南	66
关雎 / 66 卷耳 / 68 桃夭 / 69 荟蕡 / 70 汉广 / 71	
召南	73
行露 / 73 羌羊 / 74 擠有梅 / 75 小星 / 76 野有死麕 / 77	
邶风	79
柏舟 / 79 燕燕 / 81 击鼓 / 83 谷风 / 85 北门 / 88	
北风 / 89 静女 / 91 新台 92	
鄘风	93
柏舟 / 93 墙有茨 / 95 君子偕老 / 96 定之方中 / 99	
相鼠 / 101 载驰 / 102	
卫风	105
硕人 / 105 饭 / 108 伯兮 / 111	
王风	113
黍离 / 113 君子于役 / 115 扬之水 / 116 兔爰 / 117	
葛藟 / 119 大车 / 120	
郑风	121
将仲子 / 122 大叔于田 / 123 女曰鸡鸣 / 126 东门之墠 / 127	

风雨 / 128	出其东门 / 129	溱洧 / 130		
齐风				132
鸡鸣 / 132	还 / 133	东方未明 / 135	南山 / 135	
魏风				138
葛屦 / 138	汾沮洳 / 140	陟岵 / 141	伐檀 / 142	硕鼠 / 144
唐风				145
蟋蟀 / 146	鶡羽 / 147	葛生 / 149	采苓 / 150	
秦风				151
驷驖 / 152	蒹葭 / 154	黄鸟 / 155	无衣 / 157	
陈风				159
衡门 / 159	墓门 / 160	月出 / 162	泽陂 / 163	
桧风				165
隰有苌楚 / 165	匪风 / 166			
曹风				167
蜉蝣 / 168	下泉 / 169			
豳风				170
七月 / 171	鵲巢 / 176	东山 / 178	破斧 / 181	
 雅				183
小雅				183
鹿鸣 / 184	伐木 / 185	采薇 / 188	鸿雁 / 190	斯干 / 192
无羊 / 195	节南山 / 198	正月 / 202	十月之交 / 207	
雨无正 / 212	小旻 / 216	小弁 / 219	巧言 / 223	巷伯 / 226
蓼莪 / 228	大东 / 230	北山 / 235	大田 / 237	
宾之初筵 / 240	隰桑 / 244	苕之华 / 245	何草不黄 / 246	

大雅	248
大明 / 248	
绵 / 252	
生民 / 257	
公刘 / 262	
荡 / 266	
桑柔 / 270	
瞻卬 / 277	
颂	281
周颂	282
噫嘻 / 282	
载芟 / 283	

导 言

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选本。它产生于商、周之交，到春秋中叶或稍后这样一个约五六百年漫长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先民对自己社会生活的歌唱，是我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这里先把《诗经》的书名、篇目的编排及其产生的时代、地域和作者，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一）《诗经》的书名和篇目

《诗经》，原先只称《诗》，或称《诗三百》，并不称为《诗经》。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总结《诗》的旨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主张学《诗》贵在实用，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言《诗》，但称《诗》或《诗三百》，不曾提到《诗经》这个名称。

把《诗》和“经”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则先见于《庄子》和《荀子》。《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视“经”为典册书籍，《诗》为六种典籍之一。《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视“经”为学习的科目。《荀子》把培养人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所开设课程也有先修和后修的不同。而《诗》则为先修

课程之一。“经”作为一般典册书籍的通称，在这里则赋予了道可常行于“天地之间者毕矣”的意义。于是，六书称为“六经”，成为儒家宗奉用以教育儒门弟子必读的典籍。而《诗》在“六经”中则居于领先地位。

到了汉代，汉武帝首先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提倡读经的政策，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以经取士，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经；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利禄之辈，也往往皓首穷经。由是，“诗”作为“经”，又被官方确立起权威的地位。

现存《诗经》有三百零五篇，所谓《诗三百》，乃就其成数而言。但就《诗经》的篇目看，却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六篇，被认为是用笙管吹奏伴唱的“笙诗”。《毛传》认为，“笙诗”原是有词的，后来失传了。朱熹《诗集传》认为，“笙诗”原为乐曲名，在演唱时，以笙插入伴奏，原是有声而无词的。这两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因现存《诗经》实为三百零五篇，故相信朱说者较多。唯时代相隔久远，而又史无确据，争论下去，似无多大意义。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别编排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分十五，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四十篇。

《国风》诗篇，按国别加以编排。《雅》、《颂》诗篇的编排，则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篇首的篇名为组名。如《小雅》从《鹿鸣》到《鱼丽》十篇，就称之为《鹿鸣》之什。《大雅》从《文王》到《文王有声》十篇，就称之为《文王》之什。《周颂》从《清庙》到《思文》十篇，就称之为《清庙》之什。十篇以上带有零数的诗篇，不另立篇什，就编排在最后的一组篇什之内。如《小雅》从《鱼藻》

到《何草不黄》有十四篇诗，《瓠叶》以后四篇就编排在《鱼藻》篇什之内。《大雅》从《荡》到《召旻》有十一篇诗，后一篇《召旻》就编排在《荡》篇什之内。如不够十篇诗的虽分组，但不立篇什。如《鲁颂》只有四篇诗，《商颂》只有五篇诗，两颂各自成组，不立篇什。这种以十篇为组的编排方式，也许有其翻检阅读的便利；从篇什与篇什之间、篇与篇之间看，也容或有某些相似相近之处；但作为组诗，似乎看不出彼此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二）《诗经》产生的时代

《诗经》产生的时代，拟按《颂》、《雅》、《风》的顺序谈下去。

《颂》诗产生的时代 《颂》诗产生的时代，最有争议的是《商颂》，故提到前面来先谈。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商王朝祭祀先祖的乐歌，时代较早；另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正考父歌颂宋襄公的宋诗，时代较晚。持前一说法的先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为什么正考父要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师呢，这在后于《国语》的《毛诗序》里有较为具体的说明：“《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意谓《那》是汤孙祀成汤的乐歌，与《殷武》是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一样，都是商诗。商王朝崩溃之后，一部分乐官入周，《商颂》也可能随乐人转到周太师的乐府。而宋国统治者是殷商后裔，不忘殷祀，作为有名的《商颂》，能不世代相传，保存下来？但到了戴公的时候，政局动荡不安，礼乐废坏，《商颂》由是失其声之曲折，逐渐散亡。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并校勘文字，审定音节，才复其旧观。唯最后编订成书时，不知什么原因，十二篇只剩下五篇了。持后一说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襄公之

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裴骃《史记集解》说：“《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认为《商颂》是正考父为歌颂宋襄公而写定的，是宋诗。

《殷武》诗发端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毛传》解释说：“殷武，殷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郑笺》补充解释说：“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讨之。”毛、郑明指《殷武》一诗是歌咏殷高宗伐楚之事。而持《韩诗》意见的魏源却认为：“《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会齐伐楚也，殷高宗无伐荆楚事。”（《诗古微·商颂诗序集义》）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苏辙的《诗传》里就作了辨析。他说：“近世学者因此诗有‘奋伐荆楚’，则以襄公伐楚之事当之，遂以韩婴之说为可信。予考《商颂》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诗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玄鸟》）‘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此类非复诸侯之事，无可疑者。襄公伐楚而败于泓，几于亡国，此宋之大耻，既非所当颂，而《长发》之诗，谓汤武王，苟诚襄公之颂，周有武王，岂复以命汤哉？”苏氏已有力地批判了《商颂》美宋襄公的说法。

魏源又说：“楚入春秋，历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之名？”（《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严粲的《诗缉》里也已作了解释。他说：“《解颐新语》或谓成王始封熊绎于荆，至鲁僖公元年始有楚号，遂疑商时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实《韩诗》宋襄公作《商颂》之说。殊不知《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乃在南，而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盖雍州之荆也。诗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孰谓周始有荆楚哉？”严氏已有力地否定了商时未有荆楚的说法。而且，荆楚作为州国之号，可以称之为荆，也可称之为楚；故或

称荆或称楚，或合称荆楚，都无不可。所以，《殷武》诗是歌颂高宗奋伐荆楚之事，应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正考父作《商颂》的问题，皮锡瑞极力为司马迁辩护。他说：“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与襄公〕相及也。乃《宋世家》仍用考父颂殷之语，其说必有所受，断无自相矛盾。”（《诗经通论》）皮氏所称，多属旁推之词，并无确实的论据。《毛诗序》说“正考父得《商颂》”，《鲁语》说“正考父校商之名《颂》”，都说明《商颂》非正考父所作。而且，正考父是宋戴公时代的人，距宋襄公时代相去约一百三四年，也不可能作颂以美襄公。对此，王国维已做了论断：“闵马父以《那》为先王之诗，而非正考父自作也。”（《说商颂下》）当然，正考父校《商颂》或得《商颂》，使《商颂》得以流传下来，其整理和保存古籍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鲁迅先生认为：“要之《商颂》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汉文学史纲要·书与诗》）推鲁迅之意，《商颂》就是商诗。我们对今古文家有关《商颂》的争论，并结合金文等地下出土有关资料加以分析，可以认定《商颂》是商诗。周满江先生对《商颂》，也根据前人成说和新近发现的有关资料加以分析，认定“《商颂》应是商朝晚期的颂歌”（《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商颂》为商诗，当无疑义。

可是，殿三家之后的王先谦，他坚决主张：《商颂》为宋诗。并且认为经“皮、魏二十证，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原，当无异议。益叹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为可惜也”（《诗三家义集疏》）。王氏治学自信心很强，诚可敬佩。可一动感情，就不免把问题看得太绝了，不免挟有《诗》今文家宗派主义之偏见。

现在看来，王氏所谓的皮、魏论证，精确无伦，实际上并不那么